

国际关系学
当代名著译丛

王逸舟 / 主编

多边主义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John G. Ruggie
约翰·鲁杰 / 主编

苏长和等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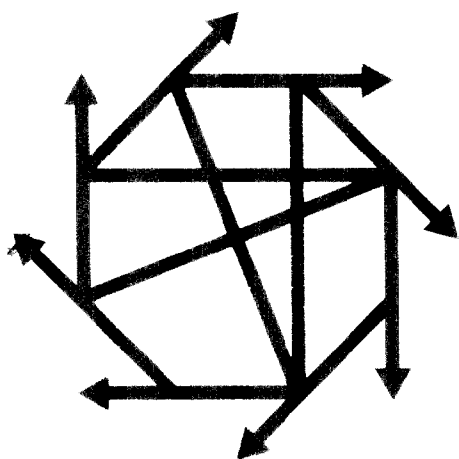
浙江人民出版社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多边主义

John G. Ruggie
约翰·鲁杰 / 主编

苏长和等 / 译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2-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边主义 / (美) 鲁杰 (Ruggie, J. G.) 主编; 苏长
河等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2

(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

书名原文: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ISBN 7-213-02496-5

I. 多... II. ①鲁... ②苏... III. 国际关系学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789 号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J.G. Ruggie Editor

Copyright©199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2 by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

多 边 主 义

[美] 约翰·鲁杰 主编 苏长和 等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42.8 万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496-5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冷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秩序已被打破,但新的秩序尚未形成,21世纪会是什么样的世纪?全球化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同时又给各国的主权、管理带来了哪些挑战?各国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护自己的利益?知识经济时代国家面临的安全隐患是什么?对所有这些问题西方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都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对时代主题、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而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我国学者尚未有令人满意的答卷,况且对国外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也知之甚少。因此,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做一些引进工作。

从文化视角看,文化是多元的,人类自有历史以来,世界各地独立地发展出富有特色的多种古老文明,如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玛雅文明等。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及当今科技的飞速发展的现实必然会促进文化的交融。纵观世界文化发展史,拒绝接受外来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消极保护只能是停滞落后。因此,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认定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尤其是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后,更需要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服务。

2 ◇多边主义◇

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了解最新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也鉴于国内至今仍然缺少一套以近一二十年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前沿课题为介绍对象的译丛,我们认为翻译出版这套书系是很有必要的。

该丛书的主要特色有:第一,全部著作是当代国际政治学界有相当影响的名著;第二,全部著作由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或正在崛起的中生代代表人物撰写;第三,基本上是近一二十年新近出版的作品,国内没有完整地翻译过;第四,选择不同流派、不同主题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力争呈现不同风格;第五,希冀能满足中国学者、学生的各种阅读兴趣,能成为国际关系专业老师、学生的教学参考书;第六,希望能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作品出版史上产生历史性影响。

当然,这些作品的作者均来自西方,其观察问题的角度及立场肯定与我们有所不同,有些可能与我们相左。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应学会分析,去除糟粕,汲取精华,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服务。

总 序

王逸舟

在新世纪之初,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引进和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里要向读者作些说明,为什么要引进这套书,它有哪些值得一读的地方。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至今已 20 多年。改革开放不仅使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也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有了很大改进。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访问和工作,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留学或进修;中国的各种出版物和传播媒介对国外情况的介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百姓享有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消费品,包括从国外引进的各种物品;人员和物质的往来不断向着新的高度迈进。然而,实事求是地讲,作为一个刚刚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把握世界的能力仍然是有很大欠缺的,历史上“中央帝国”的某些遗留思想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中国人对当代世界的正确认识。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民众不同,由于经济能力和各种因素的局限,中国仅有很小一个比例的人能够出去看看走走,哪怕其数量比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大了不知多少倍。虽然外语学习在年轻一代人中早已蔚然成风,但必须承认,国民中能够用中文以外的文字和语言同外部世界交流和了解前沿知识的人恐怕是世界大国中比重最小的。

上述局面,与中国面临的压力和实际的需要是不相称的: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核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在

预防地区冲突和消除热点麻烦、防止核扩散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世界各地蔓延以及改革包括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各种职能机构等方面,对国际和平与世界稳定负有极大责任;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又是发展中世界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能源利用、生态保护、粮食增产、人口控制等方面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整个世界相关领域的现状及变化;中国正争取在国际社会拥有充分的和完全的代表权,如力争在国际洋底开发、南极条约改进及太空和平利用等方面有更大的参与机会及发言权。中国是世界一大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中某些优良成分至今为世界所称道和使用,如何使之发扬光大,令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或“中国威胁论”等预言破产,在未来对中国亦有很大压力和考验。政治的、安全的、经济的、外交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都使中国处在一种特殊的“树未大先招风”的情势之下,让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无法无视这种局面。如果我们不真正了解世界,不真正了解中国人目前的国际位置和压力,不真正了解中国与世界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那么,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是难于持续的,中国也很难发挥与其幅员、人口、历史相适应的国际作用。

说到了解外部世界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说,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最近20年翻译出版的国际关系方面的作品,无论其数量或学派,都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的30年。然而,应当看到,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很不够。“很不够”的含义之一,是相对经济学、社会学、文学或历史学等学科而言的,在那些学科领域,翻译过来的作品,不仅品种全、数量大,而且传到中国的速度快,例如,一些国际上获奖的作品(如诺贝尔经济学和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几乎立即能够见到中文译本,而国际关系学方面相形之下便差许多。最近20年,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这10多年中的一些

有影响的著作仅译出了很小一部分,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的著述,而多数在国外有影响、尤其是很有新意的作品则很少见到。与此相关,“很不够”的另一含义,是指已经翻译过来的作品,虽然很有见地,它们仅仅反映了很少几个学派(其中主要是权力政治学派和新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从作用上看主要着眼于外交和国际战略等领域“策论”的需要,而其他学派及研究角度就介绍得很少,尤其是那些对策性不一定很明显、但学术性比较强和注重方法论的理论,如建构主义学派、女性主义学派、生态政治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批判理论、学习理论和一些交叉性多学科的观点,等等。据我看,后面这些理论学说可能恰恰是中国同行在建立有自身特点和独立视角的工作中应当注意和可以借鉴的。国际关系学之所以被称作“学”,原因恰恰在于其有相对独立的本体论、方法论,有作为通常的国际关系研究之基石的范式与范畴,有关于如何传承思想、鉴别流派、比较对照的系统化知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奠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思路创新,中国在全球安全领域、政治舞台和学术场合之更大建设性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与深化,离不开对国际上有关国际关系“学”的各种思考及其成果的吸收。

正是考虑到这种缺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斟酌之后,决定在今后若干年时间里,隆重推出“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为使这套丛书真正成为一个“拳头产品”,丛书延揽了国内外一批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组成了编委会,计划挑选当代国际关系学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派、理论、思潮和人物,分批分期翻译出版,争取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弥补出版界这方面的空白,使广大读者,特别是关心国际时事和政治的知识人,有更大的阅读选择面,能够比较不同观点和角度的长短优劣,充分地取“他山之石以攻玉”。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将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工

作提供一套带有“案头书”性质的国际关系作品。此次浙江人民出版社为“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特聘的几位编委,都是目前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最著名的中青年学者,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望,毫无疑问,他们的加盟是本丛书质量的首要保证。此外,出版社方面还专门聘请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和东亚事务专家江忆恩(Iain Johnston)教授担任本丛书编委,作为保证译著选材的前沿性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这些专家编委们的帮助下,浙江人民出版社能够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尽量挑选最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品,使广大读者读到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教学事业,进而为创立有中国人自身视角和特色的国际关系学贡献力量。

从编委会和出版社的角度考虑,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该丛书的选材、理论深度和学术分量是极其重要的。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两批译著,就是经过反复酝酿斟酌、选了又选,在众多相当出色的作品中,最后被挑选出来的。编委们既充分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需求,以求扩大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来源,也认真征求了国外一些专家的意见,使选中的作品保持前沿性和较高的学术水准。比如,在第一批五本译著中,既有当今世界最有名望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的代表作(如克莱斯勒的《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也有近些年崭露头角的新锐作者的引起广泛好评的作品(如建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还有收录了当今国际关系学界两大理论流派争论的重要文献、流传十分广泛的一本书(《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地域特色考虑,以及从读者关注的焦点与兴趣着眼,在第一批作品里,还选择了澳大利亚目前很有影响的两位国际政治学家的主要作品《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以及华裔美籍著名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学家熊玠教授的新著《无政府

状态与世界秩序》。在第二批五本译著里,我们第一次选择了欧洲学者的作品,将目前国际上颇有影响的“新安全论”的代表作之一——巴里·布赞等人的《新安全论》——翻译出来推荐给中国读者;在众多的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主义作品中,选取了重视话语分析和场景分析的力作——克里斯汀·丝维斯特的《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尤其是瞄准近十余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知名度甚高的詹姆斯·德·代元教授,选定其集当代各主要流派之代表作于一体的《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一书,将这本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已有相当引征率的著作全部翻译出来;把国际关系学界最早阐述多边主义的专著、美国著名理论家约翰·鲁杰的《多边主义》收入;将目前可能是解析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内“认同意识和文化回归”现象的最出色著作之一、由所谓“第三次争论”的主要发起者和解说者的拉彼德和克拉托赫维尔两位教授编著的《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翻译出版。这两批作品角度各异,方法不一,观点不仅十分前沿,而且呈现出相当的多元性。我们深信,对它们的认真阅读、批判借鉴,将有助于了解国际上有关这一领域的最重要知识,展现国际关系学方兴未艾的多样性和复杂层次,大大开阔一般读者及研究人员的视野和思路。

考虑到目前国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世界问题教学的特点,这套书当然有可能成为国内教学和研究的主要教学参考书之一。众所周知,最近十几年来,国家教委(现教育部)一直要求所有综合性院校开设“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课程,各地各院校编写及出版的相关的教科书已有近百本之多。然而,能够作为教学参考书使用的介绍国外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的作品却少而又少,而且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仅有的若干外国参考书籍多半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写作和出版的,这种情况自然令国内这方面专业的许多老师和学生感到了教学和研究中的诸多不便。浙江人民出版

社此次考虑出版的系列译著,便充分照顾到这方面的需求;这套丛书不仅要选取最主要的流派及方法论作品,而且将选择并出版一些国外国际关系专业的教材及参考书,尽可能使中国学生的学习视野、信息掌握以及研究方法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同代人保持同步状态。我们相信,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这种愿望最终一定可以实现,“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将能成为一般读者,特别是喜好国际政治问题的青年人的良师益友,长久地驻留在读者们的案头上。

译者序

——美国政治与多边主义

20 世纪是国际组织的世纪,各种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与此同时,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对组织战后国际生活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凡此种种,说明多边合作对于解决大范围跨国议题的重要性。因而,多边主义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实践的一项指导性原则,并且作为观念逐步深嵌于各国外交实践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多边主义观念和实践贯穿战后至今的国际关系中,但是,多边主义究竟意指什么?它对国际关系实践的意义是什么?多边主义理念推广的国内和国际基础又是什么?以及,它对当下和未来国际关系的转型具有什么启发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确为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前哥伦比亚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现任职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特别助理约翰·鲁杰于 1993 年编辑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意义:一项制度形式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文译名为《多边主义》),正是试图补充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对多边主义关注的不足。该书尽管是一本论文集,但是每篇文章构思精巧,视角独到,是迄今为止给予多边主义最为全面探讨的一本学术著作。

本书共收录了 12 篇文章,除了鲁杰的导论和克拉托赫维尔的结论文章以外,每篇文章都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多边主义问题。另外,编者用心可谓良苦,精心地将各篇文章按照角度

2 ◇多边主义◇

的不同分在三个部分中,即“理论”、“国内”和“国际”三个部分,从而既使各篇文章能够恰如其分地统一在多边主义主题之下,又可以使读者从不同角度更为全面地审视战后多边主义问题。

多边主义是指按照普遍性的原则组织三个以上的国家间关系。按照本书鲁杰的论述,多边主义具有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以及扩散的互惠性(diffuse of reciprocity)等特点,它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形式。维也纳会议后盛行的会议外交,反映了多边主义的早期形态。但是,大国协调体制从本质上讲,是均势和集体安全的混合物,而且充其量也只是多边外交,而非完整的多边主义。现在所说的多边主义,则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的设计与运行,并进一步风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倡导并力行的国际制度上。

战后世界政治中多边主义的兴起,与美国独特的世界政治理念是分不开的。在1945年前的300年国际关系中,欧洲大国一直以均势观念调整着国际关系。历次大的战争之后,均势理念在国际关系的重组中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这部分是因为欧洲主流的国际思想将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国内社会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形成秩序,但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的治理,依靠制度安排是行不通的,惟有通过均势才是可靠的。而美国的世界政治理念与欧洲却有所不同。美国认为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在性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有区别的只是国际社会所以没有达到国内社会的有序状态,恰恰在于国际社会的制度安排和供给是不足的。因而,如果法律和管制对国内社会秩序是关键的话,那么,国际社会要有秩序,最终必须依靠具有管制意义的国际制度才行。这就是为什么一战和二战结束前后,在组织国际关系方面,欧洲人仍然固守旧有的均势方式,而美国人则力图通过国际制度安排来维持国际秩序的原因所在。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后所规划的世界秩序,核心是一系列国际制度,例如贸易领域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金融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治领域的联合国,军事领域的北约以及其他低政治领域的许多国际

组织。这一系列国际制度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它们多多少少带有管制性色彩。大萧条使多数制定战后世界秩序的美国政界人士认为,如果管制对避免国内经济危机是重要的话,那么同样,管制对国际秩序的构造和维持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而,新政中的凯恩斯主义思想被贯穿于世界秩序的设计就很正常了。其实,有心的国际关系专家只要稍做观察,就会发现深嵌于战后国际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强调对世界事务施行管制的必要意义。无论是自由贸易体制,还是货币管理组织,尽管其管制能力与国内对等的制度相比还稍显薄弱,但是与先前的国际制度相比,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带有强烈管制色彩的国际制度,标志着几个世纪以来左右国际秩序设计理念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第二,这些国际制度基本上是多边主义的。美国设计的国际制度,具有相对的广泛性和开放性,以尽可能地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包容进来。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在世界事务治理上并不是简单地采用垂直式的管理方式,其独特的霸权管理体制与过去英国是截然不同的,美国的霸权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多边主义国际制度的基础上,它既要保持对这些国际制度的控制,但又要在形式上确保这些国际制度具有广泛的参与性,以赋予美国霸权管理以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合法性。

霸权政治需要的垂直式管理,与扩散的制度性多边主义之间的统一和紧张关系,既是美国霸权管理体制的独特之处,也是其矛盾之处。制度性多边主义是美国管理世界的重要资源,但是有时也对美国行动构成有力的制约。在战后美国直接或者间接倡导的贸易、海洋和环境问题多边谈判中,美国的态度显得极为暧昧和反复无常。除了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的多轮贸易回合谈判中,美国的态度稍令人满意以外,在海洋法问题和环境议题的多边谈判中,一俟结果有背美国的利益时,美国立刻退回到单边主义立场上。美国至今仍然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新近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个典型的例子。

4 ◇多边主义◇

因此,希望利用多边主义扩大美国对世界政治的参与和介入,与害怕多边主义的运行增加了其他国家对美国国际行为的制约,一直影响着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其背后动力既与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思想的争斗有关,也与美国独特的霸权管理体制有关。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单边主义势头似乎有所增强,美国对许多先前由其牵头设计的多边国际制度信心显得不足,抛开或者绕开多边制度单打独行的行为有所增加,不过,相对于半个多世纪对多边主义制度的深深卷入和依赖而言,美国近年来的单边主义政策只是暂时的。尽管多边主义制度有时的确限制着美国的行为,但是,与多边主义扩大了美国自由行动的权利比较而言,这些制约还是微不足道的。可以说,美国的霸权管理体制需要多边主义制度的良好运行。

撇开前面分析的美国政治因素不说,多边主义的勃兴也是战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结果,反映了世界政治在向积极的方向演变。战后世界政治最显著的变化,表现在参与世界政治活动的行为体数目急剧扩大。经过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运动,独立参与世界政治活动的国家数目翻了几倍。这是美国设计多边主义制度时所始料不及的事情,从而在结构上导致美国此后在联合国大会及其他多边主义谈判和多边主义组织中处于尴尬的地位,美国在有些多边制度中的意志有时不得不屈服于多数。一当美国觉得难以控制和左右多边主义制度的运行时,它就会施加必要的霸权压力,或者在既有的多边主义制度中组建新的特权集团,或者干脆另起炉灶,采取单边行动。这大体上构成了美国对待多边主义制度的几种立场。

多边主义制度的盛行是战后世界政治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我们现在时常提及的区域主义,其中也贯穿着多边主义的思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是并行不悖的。在战后欧洲的区域主义实践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者相映成趣的景象,制度性多边主义对欧洲区域主义的进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多边主义在亚洲实践的记录并不令人欣慰,因为本身亚洲的区

域主义就是先天不足的,区域主义赖以运行的制度建设也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多边主义如何立足亚洲,并在亚洲的区域主义中扮演积极的作用,应该是思考 21 世纪亚洲国际关系所回避不了的理论问题。

本书翻译是一项集体性的工作。借用鲁杰在本书英文版序言中所说的,也是“多边合作”(翻译)的结果。除了本人以外,其他译者都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在读研究生和博士生,他们受过国际政治系系统的专业 and 外语训练。他们是我的学生,但更是我的工作伙伴。他们对国际关系研究可谓热爱有加,这是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态度。我为能够和他们一起参与这项翻译计划感到非常的自豪。除了第一篇和第三篇由我所译以外,其余各篇的翻译分工如下:俞沂暄(第二篇),庄辉(第四和第六篇),吕春艳(第五篇),徐珏(第七篇),金诗薇(第八篇),薄燕(第九篇),简军波(第十篇),沈逸(第十一篇),韦宗友(第十二篇)。全部译稿由我先后作了三次统校。谢谢王逸舟老师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叶国斌先生对我们翻译工作的信任,以及自始至终的支持和鼓励。当然,译文如有任何不当甚至错误之处,衷心希望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我的 E-mail 地址是:suchh@hotmail.com

苏长和

2002 年 9 月于复旦园

前 言

当今,国际制度作为一种秩序,一定程度上显得相当强劲而具适应性。这一点不仅适应于经济事务,也适应于安全事务;不仅适应于欧洲,也适应于全球。这样说的理由不在于它们是制度,或这些制度“为人事所需”。当前国际制度秩序的核心特征是多边形式。在特定情境下,多边形式显示出具有提升其持久性和适应变迁的能力的特征。然而,多边主义概念在学术界没有完满的界定,也没有被很好地理解。本书通过历史实践的考察,追溯了它的基本含义,展示了这些基本含义是如何和为何被制度化的,并且说明了在战后一些有利于多边主义的条件发生变化后,为何多边主义仍旧在今天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为此,本论文集就这些主题进行了大量核心理论的辩论:学术界对多边主义的相对忽略应归咎于原子本体论与工具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吗(这些本体论和认识论赋予了理论化一种普遍的模式)?有可能使国际制度研究中的所谓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方法互相协调甚至可能互相丰富吗?在阐释国际秩序的类型时,何谓体系因素与内部因素之间的平衡?又何谓结构因素与观念、规范与制度之间的平衡?

本书是所谓“西海岸多边主义工作组”(West Coast Workshop on Multilateralism)的成果,这一工作组从1989年到1991年一直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赞助。福特基金会对这一主题所产生的兴趣至少可以追溯至1984年,远远早于这一主题再次变得时髦之前。那年,恩尼德·斯科特勒博士(Enid C. B. Schoettle)作为福特基金国际事务计划